

·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

“物体系—社会定在”、资本权力与数字异化

——马克思机器技术批判的解放叙事

代砚春

摘要:从马克思的机器技术批判来看,机器技术具有双重面孔,它既是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工具—机器”的历史发展的工艺“物体系”,又表征着人类现代性建构的“社会定在”。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生成了资本逻辑控制的特定权力关系与社会构序。机器技术作为资本权力的表象以时空规训排挤和驱逐活劳动,通过将之设置为产业后备军引发了“机器悖论”,其社会性布展导致了技术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异化成为机器技术异化的新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字平台的技术操作强化了对数字劳动的时空管制,构建了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数字异化的社会景观。从生产力批判视角看,拒斥或加速数字技术的发展都不能突破资本主义的“技术范式”。“数字中国”的实践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生产关系批判的平等开放的数字化构想。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形态是人们以自由姿态走向未来的必然环节和社会愿景。

关键词:机器技术批判;物体系;社会定在;资本权力;数字异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4)05-0005-08

DOI:10.13660/j.cnki.42-1112/c.016314

在21世纪的今天,以数字化、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加速演化的技术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马克思19世纪的研判——“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1](p90)}虽然马克思所说的“自动的机器体系”对比今天数字技术世界的机器技术体系相去甚远,蒸汽机的“时代动力”已然无法有效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新型社会关系;但是,马克思的机器技术批判早就发现了机器技术与资本权力的同构性关系,他揭示了一个以“资本权力机器化、政治宰制技术化、机器能力绝对化、技术占有政治化”^[2]为齐一

性特征的机器技术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当代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通过机器技术批判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消解。相反,它隐匿在现代机器技术为人类社会制造的文明进步的程式和信念之中。在此之意,马克思的机器技术批判思想仍然具有深厚的现实观照性,它促使我们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真实地进行“机器技术的追问”,并在社会历史的整体逻辑中推动机器技术的创造性变革和发展。

一、机器技术的双重面孔:物体系与社会定在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技术具有两副面孔。作为一种“物体系”,它是拥有完整工艺发展历史的可见

收稿日期:2023-10-30

作者简介:代砚春(1987—),男,哲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20CKS008)。

物性存在。从生产资料的形态看,机器技术是“生产过程运行的工艺条件……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直接条件”。^{[1](p88)}从知识的形态看,机器技术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p102)}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在物的逻辑基础上认为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工业史进程中,从工具到机器的演变标识了“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3](p429)}并将现代工厂看作是“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1](p88)}发现了“依靠机器体系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结合,只有在整个机器体系由一台自动机推动的机械工厂中才得以完成”。^{[4](p329)}马克思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艺学缺乏社会历史的视角,只是从外在形式上完成了机器技术的物性逻辑的客观记录,而问题在于物性劳动资料的演化并不能准确标识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关系的剧变。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知识对象化的具体物质器官,机器技术不仅是人类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复杂生产关系的指示器。即是说,机器技术体系这种传统物性工具的发达形态表征着人的社会生活实践能力的提升,在机器技术的客观物性形态上覆盖着社会历史的深刻内涵。换言之,机器技术的另一副面孔表征着人类现代性规划和构建中的社会定在。

首先,机器技术作为发达的物体系具有直观的物质形态,它能够直接决定人类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形式以及生产内容。机器技术不仅显示出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关系,还显示出对人们社会生活关系的塑造,甚至还在人们精神观念上制造了一种“机器技术至上”的拜物教思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之理解为生产力经济化为固定资本的形式。机器本身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一般智力”^{[1](p102)}的发展和积累的对象化成果,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则被理解为是固定资产的最适当的形式,意在表明,它就是物化在对象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1](p91)}而机器大生产时代,“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

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1](p91)}同时,伴随着人类“一般智力”的不断积累和进步,机器技术也会不断得到变革与创新,不管是在“物相”形态上,还是其物性力量上,都会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显然,当今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机器体系就是其更加完善和成熟的阶段。

其次,机器体系作为“一般智力”的对象化逐步拥有其独立性和主体性。马克思将其所能目见的大工业时代的机器技术体系理解为“自动的机器体系”,与此相应的变化是,“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1](p90)}机器技术的自动性和独立性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机器技术拜物教的前奏和物质准备。机器本来不存在于自然界中,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1](p102)}就是说,机器体系作为一种受造物,它的产生证明了人类意志的支配性和对于自然物质的优先性。但是,这样的一种人造物却天生就拥有了某种自动性和能动性。换句话说,机器技术自带的自动性和独立性表现出一种对于自身物性的遵守和打破。作为“物体系”的机器技术体系表现出了一种占有性和排他性,即是说,它将物性思维推广到了现代工厂制度中,直到卢卡奇所说的,“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5](p154-155)}可见,机器技术体系将其自身遵守的生产量化和标准化的观念注入了工人们的生产经验中,使得后者发生了观念的量化和标准化。由此,工人蜕化为由机器技术体系控制的工具,生产则成为一种脱离人的意识而客观运转的物的机械过程。这就是机器技术作为“一般智力”对对象化而引发的生产中的量化和可计算性的物化。机器体系建立的初期,工人作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1](p91)}而随着机器体系的进化,工人肢体的“有意识”相对于机器技术的客观指令,几乎

成了导致生产中断和出错的原因。因此,工人的意识性也逐渐被消除,在以自动机器技术体系为主导的生产中,工人将从“有意识的肢体”完全退化为单纯的“无意识的‘有意识的肢体’”。

再次,机器技术体系是“一般智力”转化为资本权力的控制力的具体体现。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体系连同“一般智力”的继续发展都内在于资本发展的需求。从客观现实层面来说,“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1](p93)}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6](p922)}这就是说,机器技术体系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3](p89)}其发展具有双重逻辑,一是物性逻辑,二是社会历史逻辑。在物性逻辑的支配中,机器技术体系表征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和发达状态。而在特定的资本逻辑中,机器体系又作为资本的肉身化见证了人受生产力钳制的“物役化”现象。正是在资本权力支配的前提下,不管是机器体系还是“一般智力”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资本的趋势就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1](p94)}而机器体系正是“一般智力”在工艺应用上的最佳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1](p94)}

最后,即使是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机器技术体系作为“一般智力”对象化产物的物性本相也并未被资本权力全部消解。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看,机器技术体系的物性本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仍然具有基始性意义,马克思始终是将机器体系及其资本主义应用分开理解,他为人们深入批判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机器技术异化问题提供了真实的社会场境,使人们能够有充足的空间来思索机器技术的未来可能性。当然,人们不必刻意在机器技术体系的发展中套上“哲学—人类学”的模型,即不用像人本主义的马克思那样,用“实然—应然”的逻辑张力去想象一个超越资本逻辑控制的机器体系在场。在某种意义上,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能否发展出独立的主体意识似乎表现出了超越资本控制的趋势。

二、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权力规训

在马克思的批判工艺史中,“生产过程中工具—机械工具—机器系统的出现,完全是原先纺织工人双手主体性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技艺构式的客观抽象以及重新物性模具化历史进化的结果,其中,科技物相化后的机械系统的工序和客观运行机制取代了工人主体性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技艺构式”,^[7]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工人的主体性劳动技艺已经被科学化、“一般智力”对象化的机器技术体系的客观工序所取代,劳动者本身的直接塑形能力被整合到机器技术的客观构造中,这本身就是在生产中发生的客观事实。但是,这种机器技术体系的客观的生产方式又采取了工人的主体性劳动的方式,结果反而成为工人通过劳动的物相化将商品生产出来。换言之,不再是劳动技能或是客观的劳动工序决定着生产的方式以及生产的内容,而是“一般智力”作为不在场的力量牵制着整个生产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劳动物相化的主体技艺到科技物相化的客观工序转变的机器大工业时代。

事实上,马克思对机器技术体系时代的看法除了来自他同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工艺学史的“对话”之外,还受到了现实实践的影响。马克思参观了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并充分利用了博览会的实录著作进行批判的工艺学研究。除此之外,马克思也在资产阶级的现代工厂中真实地目睹了机器技术体系的生产,“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3](p438)}在马克思的客观笔触中,大工业借助机器怪物,“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3](439)}结果是,要想理解现代工厂的生产必须使用机器技术体系的思维和术语。马克思发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

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p4)}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言“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的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3](p508)}由此看来，作为一般智力对象化的机器技术体系本身并不会压制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客观上直接引发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的比例的变化，只是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占有形式，才使它们成为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异己权力。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成为‘主人’的权力”。^{[3](p487)}进一步说，只有当机器技术体系归属于资本逻辑的、抽象的权力面孔压制其作为物质的、具体的“工具”形态时，机器技术体系才成为资本保存自身、增殖自身和表达自身的重要形式，由此也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历史效应。

首先，机器技术体系作为现代工厂的“躯体”对活劳动形成了一种时空规训，进而实现对活劳动的排挤和驱逐。资本主义应用机器技术体系，不管是从生产时间的持续性还是生产标准的齐一性来看都远远超越手工业生产时期。作为“死劳动”，它比活劳动拥有更为强劲的动力系统、耐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以机器体系为主导的现代工厂的生产由此为活劳动制定了全新的工作日制度，它突破了活劳动的工作日的道德和纯粹身体的双重界限。工人们围绕着机器而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时间和空间状态，他们的生活被切割为工作日时间和补充身体以维持工作日的时间，一句话，他们全部的生命时间都由工厂中的机器时间来衡量和决定。更糟糕的是，工作日的延长使正常的劳动力面临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的命运。即便是正常工作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资产阶级仍然以“夜班制度”“换班制度”等方法保持着对劳动力的时间的过度支配。可以说，资本逻辑控制下的机器技术体系构成了对活劳动的一种权力关系，它不仅制约着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还管制活劳动本身的再生产，“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

式的纪律”。^{[3](p488)}显然，资本充当着管理者、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和职能。

其次，资产阶级的机器大生产导致了劳动人口的过剩，进而制造了经济学史上的“机器悖论”。现代工厂的生产体系中，机器数量持续增长、运作速度不断加快，单个活劳动所能看管机器数目也愈加增多，由此，单个工人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随之增加，分工扩大化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化成为其内在要求。其结果是一部分活劳动被排除在现代工厂的生产体系之外，马克思将之称为“产业后备军”，言下之意，它虽不在生产过程中，但也绝不在生产过程外。它并不因为不直接参与机器技术体系的生产就游离在资本逻辑的控制范围外，结果就发生了吊诡一幕，“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厂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3](p469)}而马克思当然不认为这些被排斥的产业工人拥有了自由时间，资本主义的机器体系的生产趋势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p103-104)}就是说，产业后备军随时听候资本的命令，任凭其差遣。

最后，资本主义的机器应用极大地推进了资本权力的社会性布展，进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垄断局面的形成，它制造出了更为精致和复杂的技术异化现象。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借助机器技术体系首先在生产中制造了一种权力关系，“时间被导入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和刑罚体系……权力通过管理时间从而控制时间的全部使用方式”。^{[9](p92)}正如上文所说，作为死劳动的机器体系控制着活劳动的时间，使得“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3](p306)}正是借助这种时间上的“全面资本化”的方式，资本主义的机器体系实现了对人、自然以及人们社会关系的统治。马克思的批判工艺史的考察已经说明，工业生产物相化工艺的历史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并行、映射的关系。简单来说，机器技术的演化取决于“一般智力”、科学知识的更迭，而后者的发展呈现出了幂数式的爆炸式增长，这已经远不是工场手工业时期所能比拟的“工具—机器”进化迭代方式，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会在更为迅速的

意义上将整个社会导向技术的集权观念,甚至将技术拜物教设置为终极的、永恒的意识形态。到那个时候,劳动者的身心受损的情况反而成为一种技术社会的正常形态,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乃至价值审美观念都将在技术的水平上得到衡量。事实上,今天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技术复写人类社会历史图景的目的。

三、机器技术的数字资本主义应用:数字异化景观

在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主题下,布雷弗曼告诉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看问题,主要探讨机器工艺的内部联系,给机器下定义时,倾向于就机器论机器,说它是一种技术事实。另一种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探讨机器工艺和人类的关系,给机器下定义时,把它和人类劳动联系起来,说它是一种社会制品”。^{[10](p163)}显然,马克思更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机器技术的应用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进一步说,马克思将机器技术体系的发展和建构看作透视资产阶级社会演化与消亡规律的重要棱镜与线索。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发现了两大规律,即“财富和劳动时间的不可通约性规律”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前者说的是,资本对科学知识与“一般智力”的无限追求,导致了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持续下降,直至其作为财富尺度的身份被废黜。后者说的是,资本主义应用机器技术对科学知识的无止境追求将在某个历史节点上成为资本进行自我增殖的限制,机器技术体系的发展就为资本主义生产置入了自反性的崩溃逻辑,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对于前者来说,马克思分析:“将一般智力对直接劳动(物质财富)的影响等同于对抽象劳动(交换价值)的影响,进而从直接劳动的下降趋势中,引出价值机制的崩溃,这显然是有问题的。”^[11]对于后者来说,马克思的分析并未真正区分一般利润率与直接利润率的问题,这使得他的“崩溃论”说法显得有些武断并缺乏可信度。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逐步修正了这些问题,但无论如何,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清晰的,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与工业无产阶级的赤贫状态都

是随着机器技术的改进加速运动而得到加强的。另一个是,一般智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会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崩溃,机器大工业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临界点。

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已经顺利完成了几轮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了爆点,释放了资本主义的潜力,资本主义走向当代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而后者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是一种以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从机器技术自身的演变来说,它“已经彻底模糊了自然与人工制造、思维和身体、自我发展与外部设计等许多其他过去适用于生物体和机器的区别。我们的机器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活力,而我们则显得极其迟钝”。^{[12](p11)}从人们的生存形态来说,“我们的身体和一切社会行为,都被数字所穿透,我们被还原为数字平台上的一个数据簇,我们借助着数字化的虚体来参与社会交往、经济生产和政治参与。所以,今天的异化已经……变成为数字化的异化”。^[13]从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数字化的异化即是马克思所目见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机器技术异化的逻辑延展。机器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存异化的新定义。

其一,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原材料转变为数据,传统工人作为数字劳动者存在,而数字平台则是生产数据的工厂。资本主义应用数字技术将数字劳动者推入算法的架构中,通过对其进行档案化和数据化处理将其纳入数字平台的管制和治理。数据本来是由一般的数字劳动产生的,但是它一旦在数字平台上流动起来就拥有了种集体性特征,平台“垄断这些数据,然后提取、分析、使用和销售这些数据”,^{[14](p97)}数据经由平台的统计和加工,成为了可预测、可引导、可监督的流量数据,进而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并被数字资本家所占有。更糟糕的是,这种流量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劳动的再生产。它制造了一种技术的治理逻辑,即是说,人们根本无法拒绝这种数字异化,因为如果人们不能顺利地转化和生产出数据,人们就无法与数字时代对接,即不能进入这个数字化时代,当然也就无法在数字世界塑造任何社会关系。言下之意,人们必须按照数字技术的要求参与到数字化的治理中去,按照数字平台的要求进行自身的

生产,否则,任何一个个体都将被数字世界所放逐和抛弃。

其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数字劳动的兴起使得数字资本权力不是消解而是强化了对数字劳动者的时空规训,而且这种管制呈现出隐匿化、扩大化特征。在马克思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机器技术体系制造了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管控,而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境况并没有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得到相应的释放,恰恰相反,劳动者的生命时间有可能加速丧失。按照马克思机器技术批判的设想,技术进步的社会目标就是通过消减工人的劳动强度为其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推动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会将工人的自由时间转变为剩余劳动,人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感受到了一种数字劳动导致的“时间矛盾”,即明明人们通过应用数字技术节省了时间,从而拥有更多可供支配的时间进行现代化的、数字化的体验,但是,这些时间反而产生了“较大的将通过发展和运用这些技术所释放的时间资源用以进行新的分配的社会压力”。^{[15][p180]}结果是,劳动者的工作量不仅没有得到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它甚至从传统工厂时期的工作时间扩展到了人们的生活时间中,人们感觉24小时都处在数字权力的监控中。数字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将人类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将人们带向了数字劳动的新范式,从事“涉及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的所有活动……结果在资本主义媒体行业遇到不同形式的数字异化和剥削”。^{[16][p351-352]}

其三,数字异化借助数字技术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隐形机制,它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在整个现实世界刮起了数字异化的旋风。由数字劳动生产的海量数据因资本的强势介入被数字资本所占有,由于数据体现了数字劳动者群体的生活意识,因此,掌握了数据就等同于掌握了控制数字劳动者的权力,这使得它能凭借数字技术的强大运算能力准确地捕捉个体的生活习惯和消费倾向,从而更精准地进行数字化商品的生产和推送,制造消费需求将人们捆绑在数字化消费的意识形态中。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数字技术能够更有目的性地指导数字资本的流向,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和投资的盲目性。除此之外,

数据本身能够进行自身的智能生产,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实世界与赛博空间的重叠,它让人们产生了比现实世界更现实、真切的数字化体验,虚拟正逐渐吞噬现实并将现实塑形为一种数字异化时代的社会景观。

四、数字资本主义的机器技术批判路径与中国方案

自从马克思批判的工艺史发现了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将会发生“技术异化”问题直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数字异化”,机器技术已经完全融入资本主义的机制中,人们很难通过技术自身的内在发展将之从资本逻辑中剥离出去。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马克思的机器技术批判包含着一种技术决定论思想呢?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自然科学和技术自动转为社会主体(一般智力)控制物质生活过程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17][p42]}的做法使得历史抽象成了单纯的技术史。意大利自治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机器技术批判确立了一种具有主体政治学意味的技术史观,它最终将导向政治的变革,为全新的革命主体的生成提供合法性论证。显然,这两种看法都存在一定问题。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机器技术体系的建立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直接塑造了人类控制自然、征服自然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外貌。但是,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机器技术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又引发了技术异化,进而消解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使工人实质上从属于机器技术体系,慑服于资本权力,社会发展被抛入技术客体的螺旋式扩张之中。特别是从后者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机器技术批判虽然不能被判定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但是,它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构序过程中隐含的技术决定论的种子和萌芽。这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晚近出场的“后现代”的技术批判。在“后现代”的视域中,马克思时代的自动的机器功能物就已经进化为具有了“意识”的“智能物”,作为客体的技术物完全有可能“像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描述的起来反抗主人的奴隶那样,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18]机器技术的演化逻辑蕴含着这样的“辩证法”,即“不再是客体来欲求,却是转而由客体来引诱”,^{[19][p160]}结果是,“主体的立场已不再稳固,而唯

一可能的立场就是客体的立场。唯一可能的策略就是客体的策略。”^{[19](p162)}显然，技术客体一旦取得了成功，就将破坏“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综合的总体世界，主体世界将被带入倍增的螺旋中，在一种纯客体的迷狂中彻底消逝。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马克思不可能在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阐释技术决定论的毁灭性后果，但是，他对大工业的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批判确实发现了机器技术本身蕴含的极限逻辑。

言下之意，单纯从生产力视角展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技术批判甚至是拒斥机器技术体系的进步，从而设想退回到一个未被机器技术污染的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种思想的徒劳。很显然，在这种观点看来，机器技术是社会系统的决定性要素，社会的进步由此被等同于机器技术的进步。而人们若想一举克服技术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就必须破除现代化制造的进步假象，暂停甚至停止机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否则，人们将永困于生产之镜中。可以看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化的强烈拒斥更像是一种人本主义的道德呼喊。技术问题绝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意蕴。与之相反的另一个论调同样将机器技术要素看成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力量。不同的是，它们不是要退回到一个无技术的世界，而是要让技术加速发展，事实上，它们看到了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加速社会，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技术的加速。因此，不应该像前者那样失望地想象一个世界，而是应该积极地进行世界想象，拥抱技术加速的未来。它们坚信，人类目前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将在技术发展的未来进行时中得到完满的解决。于是，问题就转变为，“解放生产力的潜力，在这个方案中，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只是要将其重新导向公共性目的。现有的基础社会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20](p355)}这种观点更为复杂，一方面，它相信人类有能力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人类的主体地位将在对技术客体的掌控中得到继续加强，而这一点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它更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体向度，而并没有拿出同样的精力去阐释技术的发展如何构造出一个与超越数字技术异化社会适配的主体力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发现

了，其一，机器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造成异化现象，正如数字技术并不一定成为数字世界异化的根源那样，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也并非包含着拒绝数字技术发展的命题。其二，资本主义无论处于哪种超越的形态都不可能实现机器技术的合理运用，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技术问题及其他全球问题，只有根本变革社会关系，才能建立起技术应用的合理规范和合理界限。就是说，技术异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并且，瓦解资本的逻辑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启示人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开启生产关系批判。数字资本主义表面上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向度和所谓“普世性”，事实上，它已经在资本的无休止的财富积累和循环过程中凝固了人类走向未来的潜力，机器技术的发展由此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惯性，它用作为表象的“进步”引起的是剥削和压迫的革新。机器技术的合理应用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愿景中得到实现。一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计划和设想中，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线性发展逻辑。即便是今后技术的发展真的落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座架，也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发展的全部走向。除此之外，数字资本主义声称数字技术是共享技术，基于数字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平等的、公正的世界。这又是一套掩盖数字资源不平等的真实情况的资本主义话术和意识形态。从数字技术自身的发展来说，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分岔口，它可以导向更精致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架构，进而持续产生对数字无产阶级的无形剥削和隐蔽压迫，也可以导向一个公有的互联网的媒介，成为一个由数字劳动者共同生产和共同控制的社会媒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1](p571)}换言之，在数字化时代，人们本身就是潜在的“数据共同体”，我们享有“相互交流和相互行动的共同空间”，^{[22](p67)}通过技术的加速，让公共权力介入平台建立普遍数据共享的运行模式能够有效实现数据的“共在”向“共有”“共享”的转变。二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实现驯服数字资本，克服数字化的异化的问题。“当社会成为全部生

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23](p310)}

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之一就是建设“数字中国”。它的基本要求是坚持数据和平台的公有化,推进公共数据的有序共享和开放,更重要的是,这种数字平台的建设将推广到教育、医疗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公共领域,它通过数字技术的大发展来统一城乡的现代化建设,在数字利民、数字惠民的基础上,将“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建设方案和理念推广到国际交往中,从而有效对抗数字资本主义制造的数字异化,努力打造一个共商共赢的数字化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中国”的具体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平等开放的数字化未来的可通达性,同时也证明了消解数字异化、突破数字资本主义帝国的技术霸权实现解放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象和社会实践中,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形态是人们以自由之姿占有未来的必然环节和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涂良川.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机器技术哲学叙事[J].哲学研究,2022,(9).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7]张一兵.工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构境——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笔记”研究[J].哲学研究,2022,(12).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9][法]米歇尔·福柯.惩罚的社会[M].陈雪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0][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朱基俊,吴忆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1]孙乐强.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12]Haraway D.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 [13]蓝江.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9,(6).
- [14][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15][德]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6]Fuchs C.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17][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8]代砚春,薛天天.集置、致命策略与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技术批判的三重向度[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6).
- [19][法]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M].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0]Mackay R, Avanessian A.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M].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Žižek S. Pandemic! 2: Chronicles of a Time Lost[M]. London&New York: OR Books, 2020.
-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豫